

产权 不完备性 研究

产权经济学还没有一个关于多种形式的产权结构如何形成的分析框架。在本书提出的“产权不完备性”概念基础上，通过产权界定成本和产权实施成本的经济分析，给出了“事实上”的产权与“法律上”的产权发生偏离的原因。降低产权实施成本是减少产权的不完备性最终出路。为此选择实施成本“最低”的产权形式就成为效率的要求。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界定平等的产权是产权制度的“自我实施”前提，因而也是降低产权实施成本的选择。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在技术水平给定时，资源的“物理性状”将决定产权的实施成本。因而应当根据具体资源的“规模经济”要求选择“不完备性”最低的产权形式。所以，在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制度时，与资源的“物理性状”对应的多种产权形式因此产生。这样的产权形式构成的现今的产权结构，根据国有产权的经济功能，本书认为，对于我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应该从上收剩余索取权着手，细化利益格局后再通过产权改革来引入竞争。

兼论国有企业改革思路

严冰◎著

产权不完备性研究

——兼论国有企业改革思路

严冰 ◎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提出了“产权不完备性”的概念，通过产权界定成本和产权实施成本的经济分析，给出了“事实上”的产权与“法律上”的产权发生偏离的原因。以产权不完备性为依据，分析公有产权、国有产权、集体产权及私有产权效率的配置问题。根据国有产权效率配置，探讨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趋势。

读者对象：经济学和法律领域研究人员及实务工作者，高校师生及大众读者。

责任编辑：黄清明

责任校对：韩秀天

文字编辑：何文文

责任出版：卢运霞

装帧设计：**Edesign**書裝設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产权不完备性研究：兼论国有企业改革思路 / 严冰著.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3

ISBN 978 - 7 - 5130 - 0198 - 4

I. ①产… II. ①严… III. ①产权—经济学—研究 IV. ①F014.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8917 号

产权不完备性研究

——兼论国有企业改革思路

Chanquan Buwanbeixing Yanjiu

严 冰 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 编：100088

网 址：<http://www.ipph.cn>

传 真：010—82005070/82000893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邮箱：hqm@cnipr.com

责编电话：010—82000887/82000860 转 8117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刷：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印 张：11.5

开 本：720mm×960mm 1/16

印 次：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版 次：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定 价：32.00 元

字 数：220 千字

ISBN 978 - 7 - 5130 - 0198 - 4/F · 370 (3142)

出 版 权 专 有 侵 权 必 究

如 有 印 装 质 量 问 题，本 社 负 责 调 换。

前　　言

本书是在笔者 8 年前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当初毕业时，受导师和论文评阅人的呵护或抬爱，前辈们曾给笔者当时的博士论文较高的评价。笔者天性愚钝，全不知前辈含蓄的勉励，竟然还心生几分满足。一位师兄在讲到他自己的学问之路时，曾不无感慨地表示，博士毕业只是意味着学术道路才刚刚开始，若要将学问贯通，最好能再有几年的闭关与修炼。

以笔者当时愚见，博士即是人生求学的最后阶段，博士论文就应该是自己学术人生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高点。不过，说归说，想归想，谁也没有真正地去闭关，也没有更多考虑如何走向另一个学术的高地。

无论是出于工作“紧张”，还是由于自己懒惰，博士论文被放在高高的书架上，精心保存着；但具体的内容已基本被遗忘。当时间来到 2009 年底，博士论文的出版被提上日程，论文才从书架上被请了下来。原本以为只需做简单修改、润色就可以将书稿教给出版社。但在文稿的整理中才发现，自己曾经的“得意之作”其实问题多多。于是一场规模浩大的修改工作随即展开……

又是半年多的艰苦写作，这部书稿才算完成。这部在时间、精力上投入不菲的论著对读者有多大的裨益暂且不论，更多的是要给自己一个交代，即自己不满意的东西不能拿出来示人。

产权经济学是当代经济学的热点之一，已有大量的成就取得。在基本理论上，相关成就主要见于西方学者近 30 年来的研究。但如本书所揭示的，西方产权理论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西方产权经济学迄今还没有一个完整的产权结构理论。第二，西方产权经济学缺乏一个产权选择的理论体系。

本书提出了“产权不完备性”概念，即法律上的产权与事实上的产权“偏离”或“错位”；这个概念其实也可以用到制度层面（如制度不完备性）。罔顾产权不完备性来讨论产权的配置效率没有意义，因为产权不完备，产权的配置也无法精确化。产权不能尽量精确，资源的配置当然无效率可言。

通过分析产权不完备性产生的原因，笔者探讨了产权界定成本与产权实施成本这两方面的因素。正是由于产权的界定成本、产权的实施成本的存在使得事实上的产权会与法律上的产权发生偏离。减少产权不完备性就是要减少产权

的界定成本，或产权的实施成本。产权界定成本的节约无疑是符合效率的考虑，但产权终究要投入使用，所以产权的实施成本的高低才是产权形式是否符合效率要求的准绳。从操作意义上说，应该界定实施成本尽可能低的产权。

如何才能界定实施成本尽可能低的产权，即产权如何做到“自我实施”？本书的分析结论是，尽可能界定权利平等的产权。为此本书提出了产权界定的“内涵原则”和“外延原则”。这两个原则的落实基本能够保证产权的自我实施，即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侵权激励”。在此基础上，作为降低产权实施成本逻辑的延续，本书提出了技术水平一定下，资源的“物理性状”决定产权形式选择的观点。这意味着，在资源出现“拥挤”时，应根据资源物理性状的规模选择相应的产权形式，以达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由于资源的物理性状不同，我们将得到不同的产权形式。这些对应资源“最大化”利用的产权形式，都是诺斯所谓的“以最小成本形式存在的产权形式”。所以在本书的结论中得出了由最小实施成本存在的不同形式的产权。这些实施成本最小的产权形式构成了本书所谓的“最优产权结构”。

虽然本书给出了理论上的“最优产权结构”模型，但经验中的最优产权结构是由四类产权组成，即公有产权、国有产权、集体产权、私有产权。本书对以上四类产权的效率与非效率方面都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理论上后续（排他性更强）的产权是作为前一（排他性较弱）产权非效率方面的“替代物”而相继产生的。

国有企业作为国有产权资源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效率的功能定位与其他国有产权的资源并无二致。本书最后一章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思路的探讨，是本书产权的分析逻辑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实践中的一个应用。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思路，与理论分析及实践探索一致，这条思路还会被继续演绎下去。

期待国有企业“独善其身”后“兼济天下”的观点是对国有产权资源经济功能的“倒置”，因而效果不可能尽如人意。所以，针对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笔者认为应该先从上收剩余索取权入手。在弱化垄断行业的利益格局后再在竞争性行业重新推行产权改革。至于外部性强的行业或领域应该继续由国家“控制”，如政府对私营企业经营公用事业的“规制”，当然也包括采用国有企业的形式；如果规制成本高于管理成本的话，国有产权的蕴涵的低效率（如数量冲动、目标偏离）极易注重服务或产品的数量，忽略质量。这种“考核”已给社会带来了许多弊端。

见证本书从论文到书稿全部写作过程的人是我的妻子古莉。我要感谢她在我艰苦的探索和繁忙的写作过程中所给予的支持和理解。

目 录

1 私有财产，祸兮福兮	(1)
1.1 约束与激励	(1)
1.1.1 作为约束机制的私有产权	(2)
1.1.2 作为激励机制的私有产权	(4)
1.1.3 作为计算工具的私有产权	(6)
1.2 财产结构如何选择	(8)
1.2.1 问题与主义	(8)
1.2.2 本书主要观点及结构	(11)
1.3 本章总结	(16)
2 产权不完备性	(17)
2.1 不确定性问题	(17)
2.1.1 不确定性探讨	(18)
2.1.2 产权不完备性相关研究	(21)
2.1.3 产权不完备性概念及研究方法	(29)
2.2 产权不完备性成因探析	(33)
2.2.1 不完全合约与“无关定理”	(34)
2.2.2 源于产权界定的产权不完备性	(37)
2.2.3 源于实施成本的产权不完备性	(42)
2.3 产权界定的效率原则	(52)
2.3.1 作为平等的效率	(53)
2.3.2 作为公平的效率	(57)
2.3.3 作为利他的效率	(60)
2.4 本章总结	(63)
3 产权结构的选择	(65)
3.1 最优产权结构探讨	(66)
3.1.1 科斯定理与最优产权	(66)
3.1.2 产权结构的理论探讨	(76)
3.1.3 产权结构与经济演化	(81)

3.2 四类产权及效率分析	(84)
3.2.1 公有产权及效率分析	(85)
3.2.2 国有产权及效率分析	(90)
3.2.3 集体产权及效率分析	(98)
3.2.4 私有产权及效率分析	(106)
3.3 本章总结	(115)
4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思路探讨	(117)
4.1 国有企业功能定位	(118)
4.1.1 国有企业传统理论	(118)
4.1.2 国有企业的产生	(122)
4.1.3 国有企业功能分析	(128)
4.2 国有企业效率问题分析	(135)
4.2.1 国有企业效率冲突	(135)
4.2.2 国有企业产权不完备性	(139)
4.2.3 我国国有企业的低效率	(144)
4.3 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148)
4.3.1 理解改革逻辑	(148)
4.3.2 明晰改革思路	(153)
4.3.3 选择改革策略	(158)
4.4 本章总结	(165)
参考文献	(167)
后记	(177)

1 私有财产，祸兮福兮

若为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

——《孟子·梁惠王上》

“经济人”梦寐以求的是形形色色的“财富”或各种类型的“资源”。但是，由于财富、资源存在稀缺性（scarcity），大多数人终其一生实际能够拥有财富、资源的数量与愿望大都相去甚远。另一方面，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人们也可以利用资源（如土地、资本、劳动）创造出种类繁多的财富，以满足自己或社会的多方需要。不过，人们创造财富的生产活动其实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即生产成本。这就注定了就整个社会而言，试图用增加社会财富的生产（供给）来提供“免费午餐”的考虑最终都会落空。这意味着，人类对财富的“饥渴”其实无法通过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来得到解决。有得必有失是稀缺性的本意，资源或财富的“拥挤”问题很大程度上与人们对财富的“渴望”或人性中所谓的“贪婪”无关。因为即使你的需求量不多、价格也不贵，但相关的需要仍然必须付出代价（成本）才能获得。那么，面对资源、财富的“拥挤”问题，人类社会应该用何种方式配置稀缺的资源，才能更好地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呢①？关于这个问题，不仅先哲们贡献了许多真知灼见，人类社会还为此上演过轰轰烈烈的历史大剧。

1.1 约束与激励

当人类面对资源的稀缺性或“拥挤”问题时，人类社会已进入到了一个文明的历史时期。尽管在应该如何配置稀缺资源的问题上人类社会进行了无数的

① 从经济演化的历史看，高效率的生产方式是适应、模仿和失误的结果（Achian, 1950），而不是经济人“最大化”设计、选择的后果。这意味着尊重资源稀缺性的社会结构将有更大的生存可能。

尝试，但学者们总忘不了用他们的“剃刀”去选择一种财产关系❶，即私有产权来分析其有效性。概括起来，通过约束机制、激励机制和计算功能，私有产权的建立有助防范资源稀缺性问题的恶化。

1.1.1 作为约束机制的私有产权

私有产权又将资源量化到了个人或家庭，这无疑限制了他人对该财产的利用。对他人利用相同资源的这个限制又叫排他性（exclusive）。资源的排他性制度安排被认为可以避免“公地悲剧”问题。

防止掠夺

早在 17 世纪中叶，英国学者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就曾明确提出过私有产权的思想。霍布斯在其代表作《利维坦》（1986 [1651]）提出，如果所有的人对一切东西都有同样的权利，那么，为了“竞争”（求利）、“猜疑”（安全）和“荣誉”（个人名誉）这些人都想得到，或要防备的东西，人们就会用暴力夺取的方式来决定上述东西的归属（p. 94）。在一个暴力决定财产归属的社会，“没有你的、我的之分”，每个人能得到的东西只是在他能保住它的时期内才是他的。在这样的情形中，人类将处于一种霍布斯所谓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而且人类相互间的掠夺还将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害：

在这种状态下，产业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其后果不稳定。这样一来，举凡土地的栽培、航海、外洋进口商品的运输、舒适的建筑、移动与卸除须费巨大力量的物体的工具、地貌知识、时间的记载、文艺、文学、社会等等，都将不存在。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之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pp. 94—95）

所以，由“利维坦”这样恐怖力量（例如，国家政权）来对人们各自的财产所有权进行界定❷，即对财产作出“你的、我的”的划分，禁止人们超越自己权限的夺取，才能结束这种“人人互为战争的状态”。

1968 年，美国生物学家哈丁（Garrett Hardin）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

❶ 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由 14 世纪逻辑学家奥卡姆（Occam，1285~1349）提出。这个原理的表述是“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即“简单有效原理”。

❷ 利维坦（Leviathan）在《圣经》中是一种力大无穷的海怪，基督教中利维坦是恶魔的代名词。霍布斯用它作书名，其以暴制暴的国家理念十分清楚。

《公地的悲剧》一文，从人口增长与资源匮乏的角度，再次表达了与霍布斯同样的财产思想：人人享有公共资源将导致所有人的毁灭（freedom in a commons brings ruin to all）（p. 1244）。这样消耗资源无疑是人类的一场悲剧（tragedy）。哈丁给出的解决方案自然是通过政府建立私有产权以及限制人口增长来防范人们对公共资源的过度攫取。

哈丁讨论“公地悲剧”的原意已不是霍布斯时代如何选择财产制度的问题，而是如何防止因人口增长可能导致的资源使用“拥挤”问题。作为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人口理论”的现代版本，公地悲剧产生的原因仍然是资源、环境与人口增长的冲突（马尔萨斯抑制）。无心插柳柳成荫，哈丁归纳的“公地悲剧”原理被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文献广泛引用❶，以至于人们几乎都忘记了他生物学家的身份。

中国古代也有私有财产定天下的思想。如《吕氏春秋·慎势》中记述了慎子的一段言论：

慎子（前 390~前 315）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人不顾。非不欲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天下及国，在乎定分已矣。（p. 148）

归属没有确定的兔子一只也会引来众人哄抢，就是尧这样的贤德帝君也会拼尽全力，何况普通百姓？而市场上摆满了兔子，但就连地位低下的人也不会去争抢，因为这些兔子的归属已确定（分已定）。所以，治国安邦之道就在于明确财产的归属啊！

保持恒心

“亚圣”孟子（前 372~前 289）曾明确表达过“制民恒产”的思想（见《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梁惠王上》）----“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即如果老百姓没有属于自己的财产，老百姓做事情就失去自己稳定的行动目标与志向。

新制度经济学从“发生学”的角度，考证了私有产权和公共权力的产生。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 1994 [1967]）论证了 18 世纪初，北美魁北克地区因动物皮毛价格上涨导致了当地印第安人的公有狩猎场向私有猎场转变。

❶ 哈丁在该论文中承认，“公地悲剧”的思想来源于一个叫 William Forster Lloyd (1794~1852) 写的一本鲜为人知的小册子：*Two Lectures on the Checks to Populations*。

阿姆拜克 (Umbeck, 1977) 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分析，论证了私有产权的产生。1848~1866 年美军侵占了原属墨西哥的领土加利福里亚，使得当时、当地的“矿产法”(mining law) 成了空白。但随淘金潮 (gold rush) 蜂拥而至的淘金者们，却通过签订契约 (contracts) 的方式，界定了私有采矿权 (mining rights)。阿姆拜克以此证明了“私有产权的产生”(the emergency of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巴泽尔 (Yoram Barzel, 1989) 从美国奴隶制度的实施成本（奴隶的激励和奴隶的逃亡）“过高”的角度，探讨了奴隶最终获得自己身体的产权逻辑：“到 19 世纪末，美国基本废除了奴隶制，其原因大概是保护这种制度所花费的成本已超过其净收益。”(p. 115)

如此说来，我们应该把私有财产的保护视为各种产业得以发展的前提。所以，私有产权是福 (blessing) 不是祸 (curse)。

1.1.2 作为激励机制的私有产权

私有产权虽然有助于防范公地悲剧，防范“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却因此导致了“一部分人”反对“一部分人”的战争。由于资源就那么多，你有了，很可能我就没有了。所以“你的，我的”的产权界定并未消除财富、资源的稀缺性问题，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满足人们对财富的强烈需求。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平复人们对财产的渴求却又不致引起内部的争斗呢？

天下为公

私有产权的产权界定在很大程度上不仅给人们的财富攫取行为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且还导致了社会财富占有两极分化。其后果是，一方面原本作为手段的“物”变成了人们命运的主宰，导致人性的全面异化 (马克思, 1979 [1932])；另一方面，私有财产权利下人与人之间对于财富的争夺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因财富占有的不平等，使得这种争夺成为少数富人 (统治者) 与大多数穷人 (被统治者) 间的社会规模的斗争。

所以，在西方早于霍布斯一个世纪，以托马斯·莫尔 (Thomas More, 1487~1535) 的《乌托邦》(1996 [1516]) 为先声，宣扬财产公有制的思想就开始崭露头角。到 19 世纪初，经过法国的圣西门 (Comte de Saint-Simon, 1760~1825)、傅立叶 (Francois-Maire Charles Fourier, 1772~1837) 和英国的欧文 (Robert Owen, 1771~1858) 等人大力宣传和积极实践，主张实行社会公有制的观点逐步发展成为在当时欧洲颇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潮。不过，由

于他们的学说未能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产生的必然性给出合理的论述，所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人的公有制社会思想被后人称为“空想社会主义”。

在“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家们看来，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剥削、压迫（雇佣劳动）和其他社会冲突的社会根源。一方面广大工人拼命干活，却仍然食不果腹；另一方面，少数资本家却占了大部分劳动产品，过着奢侈的生活。因此，当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 1809～1865）发出“财产就是盗窃”（《什么是财产》，2009 [1840]：p. 44）的控诉时，他应该的确道出了广大劳动者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发自内心的憎恶。

无独有偶，被中华民族尊为万世师表、圣人的孔子（前551～前479）也对“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心驰神往，并认为，一旦天下为家、货力为己、划分田宅（立田里），于是“谋用是作，兵由此起”^❶。孔子“大同世界”的思想甚至为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如康有为、孙中山人等所接受。如此看来，私有财产是“祸”不是“福”。

科学设想

从学术上看，“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恩格斯，1972 [1880]）是由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卓绝的理论研究和鸿篇巨制的著述来完成的。

马克思（1979 [1932]）虽然认为“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p. 62），但他却不是从单纯同情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幸遭遇的角度来建构其社会主义理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生产力的“社会化”发展趋势（规律）将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构成冲击，使之逐渐向社会所有制（或公有制）转变。因此，生产的社会化发展规律注定未来社会将实行生产资料社会所有的“公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把“消灭私有制”作为共产党人的理论（《共产党宣言》，1958 [1848]：p. 480），但他们又认为“剥夺剥夺者”的行动即使必然发生，那也不过是在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规律中起“助产士”作用而已。

马克思过人之处在于他没有因循前人关于私有财产是“祸”是“福”的道义方面的争论。在他看来，一个社会的生产采取何种所有制是由提高生产力（生产效率）的需要决定的。虽然马克思关于未来人类社会的宏大计划体制构想尚未被历史证实，但他的研究的确给后人提出了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人类

❶ 孔子大同世界的思想见《礼记·礼运篇》的记述。

的经济活动在多大程度上由计划（planning）来安排才有效率？

1.1.3 作为计算工具的私有产权

经济活动必须要精打细算，但在精打细算之前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一是拿什么对象作为计算的单位，即计算什么对象的价值；二是谁有激励（积极性）对该单位进行计算，即人们为什么要去计算。相比之下计算的激励更具有本质性，因为经济学的计算是以经济人的效用水平为依据的，即离开积极性，计算就失去了意义。

计划与计算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当人类社会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俄罗斯建立之初，1920 年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就发表了《社会主义共同财产中的经济计算》（*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 Wealth*）一文，对社会主义计划的经济效率提出了质疑。相关讨论延续到 20 世纪 30 年代，终于发展为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中央计划”是否可行的国际大讨论。

兰格（Oskar Lange，1904～1965）和勒纳（Abba Ptachya Lerner，1903～1982）是“中央计划”辩论的正方“领队”。作为米塞斯的弟子，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继承了导师的衣钵，把捍卫自由放任的市场作为他毕生所追求的目标。因此，哈耶克自然成为“中央计划”反对方的“领队”，而且在当时他的队友也差不多就是他本人。

兰格、勒纳关于“中央计划”可行的正方观点，也被称为“兰格—勒纳—泰勒模式”或“兰格模式”。在米塞斯看来，社会主义因为缺乏私有产权（private ownership）和市场，因而将导致经济计算（economic calculation）缺乏、责任与激励（responsibility and initiative）不足的效率问题。米塞斯因此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背弃理性经济”（the abolition of rational economy）。针对米塞斯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兰格模式”给出的解决方案非常简单：①社会主义可以保留消费品或劳动力市场，从而保留消费品或劳动力的市场价格；②根据消费品、劳动力的市场价格，通过试错（try and error）办法“模拟”出生产资料价格，从而解决社会主义“共同财产”（common wealth）下生产资料的市场定价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保留消费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就可以通过构建 n 元方程来“计算”或“模拟”出社会主义制度下被公共占有的（即不进行市场交易的）生产资料的价格。

“兰格模式”的结论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计算是可能的，因而不存在效率问

题。“模拟价格”无疑是“兰格模式”的核心❶。

信息如何得到

在论战中，哈耶克对“兰格模式”的最初反驳是，由于“中央计划”所要的数据太多、搜集的成本太高，所以“中央计划”（即 n 元方程的建构）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但后来哈耶克（2000 [1945]，2005 [1988]）从这一立场上后退了。哈耶克（2000 [1945]）认为“中央计划”在理论上也不可能，“原因是，对整个社会来说，经济计算赖以开始的‘数据’永远不会被‘提供给’一个能够找出其意义的大脑，而且它们永远也无法被提供出来。”（p. 45）

在米塞斯、哈耶克看来，私有产权其实既是消费者的偏好，也是企业生产成本的信息载体及消费者效用的信息载体。只有通过市场参与人的价格竞价，分散在人们头脑中的知识才可能通过价格指数得到体现。社会通过私有产权的价格指数，使人们头脑中的知识（即私有产权标的物的价值、效用等）在商品的定价中得以显示。所以，私有产权的交易是社会利用分散知识的唯一有效途径；离开了私有产权，价格将不存在；价格不存在，人们头脑中的知识就不可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米塞斯还认为，由于劳动质量的不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labor theory of value）无法作为测度社会主义生产效率的工具。

同样在 20 世纪 30 年代，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竞争低效率的观点，由科斯（Ronald Harry Coase）在其开拓性论文《企业的性质》（1994 [1937]）中以“交易费用”的面目被提了出来。不过，当时的科斯名不见经传。作为刚出校门的大学生，科斯的论文实际上也是在探讨“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企业为什么出现？企业的边界怎样确定？）。不过，科斯的研究完全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自然与同一时期哈耶克和兰格间正在进行的“中央计划”的论战失之交臂。

通过《企业的性质》这篇论文，科斯告诉人们，计划是有效率的，不过计划的效率也是有限度的（企业存在边界）。而且，还是这个科斯，22 年后又发表了《联邦通讯委员会》（1994 [1959]）一文，从完全独立的角度对上述问题给出了他个人的综合性回答：①价格是“决定收益与成本的精确货币量化标准”；②市场参与者掌握了更多的资产价值信息；③价格机制只适用于“私人

❶ 相关文献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3），第 139 页的“lange—Lerner Mechanism”词条。

部门”。

1.2 财产结构如何选择

斯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 1999) 认为, 20 世纪初和 20 世纪末分别被两次伟大的经济学实验 (two great economic experiments) 打上了印记。一次是 20 世纪初的从市场经济转向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 以前苏俄 1917 年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为标志, 该项经济学实验的结局现在已经清楚了。第二次实验是社会主义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实验, 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为标志。后一项实验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弄清楚, 例如市场化改革有哪些教训、计划经济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要往哪里去?

1.2.1 问题与主义

社会主义的经济实验曾经如此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 曾经寄托着那样崇高的人类理想, 甚至也曾经取得那样辉煌的经济成就。但所有的辉煌与梦想都在 20 世纪末戛然而止, 历史运行轨迹的改变是“历史的终结”, 还是要续写辉煌?

现实的嬗变

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并非只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以公有制财产为基础的社会制度 (社会主义) 也并非只是一般理论意义的科学论证, 而是一场发端于 20 世纪初的影响整个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

20 世纪初, 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俄国建立。在那个期间以后,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瓜分世界、掠夺殖民地的冲突进一步升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大部分老牌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实力都遭到削弱, 美国成为新霸主。但在这次帝国主义发动的瓜分殖民地的、世界大战的裹挟中,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革命的浪潮也相继催生了东欧、中国等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诞生。世界的另一极——以前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崛起。

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 以及这些国家随后取得的令世界瞠目结舌的高速增长, 似乎已完全将米塞斯质疑的“共同财产”的“非理性经济”问题扔进了“太平洋”。然而, 当时间来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 计划经济的弊端开始显露出来。粗放式经营导致的资源浪费、共同财产引起的“搭便车”和

“公地悲剧”、经济运行大起大落等问题，使计划经济曾经的高速发展被经济衰退、收入下降所取代，以至于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得不着手重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❶。到 20 世纪末，社会主义国家大都在改革中自觉或被迫放弃了计划手段，纷纷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

其实市场只是“手段”，因为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社会主义国家对财产制度进行根本性的调整。按照米塞斯（1920）和科斯（1994〔1959〕）“经济计算”的逻辑，市场价格计算的前提是产权私有。所以，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最终还是被推到了前台。打破计划经济生产资料单一公有制，引入多种所有制的产权格局成了全部改革的重心。而公有制“重心”的“解构”最终还导致前苏联和东欧彻底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

当市场取向不再是问题的时候，如何实现向市场的转型又成为学术界和转型国家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与之对应的两条改革路径是：前苏联、东欧采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Jeffrey Sachs）开具的“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药方，结果导致前苏联的解体和其经济近 10 年的严重衰退；另一条是中国自己探索的“渐进主义”（gradualism）改革道路，在维持国家宏观局势基本稳定的同时，中国经济取得了 30 年、年均 GDP 9.2% 的高速增长。同是经济转型，为什么在道路、效果方面会截然不同？

中国的道路

1999 年，斯蒂格利茨以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身份，在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年度银行会议上发表了《改革向何处去？》的主题演讲（keynote address）。面对当时俄罗斯经济的 10 年衰退和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和中国的“渐进改革”两种模式孰优孰劣早已昭然若揭。斯蒂格利茨抨击“华盛顿共识”（John Williamson, 2004）用“宏观经济稳定、自由贸易、私有化、取消政府管制”等主张，误导了处于经济转型中的东欧、前苏联等国家，造成了这些国家（特别是前苏联）的经济衰退。

斯蒂格利茨用数据说明，尽管也存在许多严峻的挑战，但中国获得了巨大成功却是不争的事实，并“创造了自己的转型道路”（created its own path of transition）（p. 3）。

❶ 其实，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结构调整就已有试探性改革（蒲国良，2009）。

与“华盛顿共识”功过是非引起极大争议相反^❶，继斯蒂格利茨之后，西方舆论和学者对中国经济良好表现的认识，逐步完成了从“迷思”（myth）（George J. Gilboy, 2004）向“共识”的转变。近些年来，有关中国经济转型的讨论——如“北京共识”、“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已吸引了世界上越来越多学者的目光。

2004年，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发表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The Beijing Consensus*）的研究报告，正式提出了“中国模式”的概念。该研究报告认为，锐意创新与实验、混合所有制理论以及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三方面，是“北京共识”的主要特征。中国经济发展如此成功，以至于曾断言“历史终结”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 1989），几年后竟“出乎意料”（2006）地转变了态度，主编了一本包含预言21世纪世界将“流行中国式社会主义”主题的畅销书^❷。

“休克疗法”与“渐进主义”孰优孰劣？“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谁更能经得起事实的检验？有关这些“主义”的讨论恐怕只有等待“历史老人”来给出评判了。但在这些“主义”中蕴涵的诸多“问题”学者们现在就必须要面对、要研究。

就我们身处其中、被公认是最为成功的“中国模式”而言，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清醒，认识到我们所面对的现实问题。例如，我们现在关注的、经历了30年改革探索得到的所谓“中国模式”仅仅是经济演化过程的一个阶段，还是我国经济演进的最终形态？如果我国的经济结构还将继续演进，那么“北京共识”又是否也到了应该“终结”的时候（姚洋，2010）？

本书的出发点

财产制度中的“问题”是本书的出发点。本书将关注作为对“华盛顿共识”私有化主张的反动，“中国模式”其现在的“多种所有制”产权结构是已趋于稳定还是将迎来更大的变化^❸？作出相应判断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

❶ 当然，肯定“华盛顿共识”积极作用的学者也不乏其人，如Williamson本人（2004）、姚洋（2010）等。

❷ 该书国内还没有销售，相关信息主要是鉴于学者的介绍。

❸ “多种所有制经济”是由中共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